

2015 年,人民币该不该贬值?

■ 张斌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一般而言,提升国际竞争力,除了提高生产率,还可以降低工资或者货币贬值。给定生产率,更低的工资或者更便宜的货币,带来更低的出口品价格和进口替代品价格,提升本国产品对外国产品的竞争力。

如果有经济学家建议降低工资,这样的经济学家会成为异类。但是如果经济学家建议让货币贬值,也许会赢得不少赞许眼光。最近持此建议的经济学家不少,中国也是如此。

为什么降低工资遭受痛恨,而货币贬值却受偏爱? 首先,这并不表示汇率比工资更能刺激国际竞争力。从中国过去十多年的情况来看,农民工收入从 1000 多元涨到 3000 到 4000 元不等,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的双边汇率或者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加权汇率)升值不过 30%—40%。浙江大学茅锐和我关于中国出口份额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上涨,而非货币升值,是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增速趋势性下降的主要原因。

货币贬值更受青睐,主要的原因是货币贬值比降低工资带来的购买力损失更隐蔽。同样是购买力损失,货币贬值是一场蒙上眼睛的盗窃,而降低工资是面对面的抢劫。货币贬值让本国货币购买力受损,究竟每个人从货币贬值中承受了多大损失? 这个很难算清楚,那怕受到损失也未必把帐算到货币贬值。降低工资带来的损失,每个人都一清二楚。

当遭遇经济困难的时候,货币贬值相比降低工资是更有人情味的选择。想想欧元区,如果货币能够大幅贬值,重债国家的就业市场压力和政治博弈的困难要小很多。希腊在加入欧元区以前,也遇到过债务缠身和经济困难的时候,接下来是货币大幅贬值和政府下台,债务和经济增长难题慢慢随之缓解,劳动力市场也不会太糟糕。如今希腊绑在欧元身上,贬值不



如果有经济学家建议降低工资,这样的经济学家会成为异类。但是如果经济学家建议让货币贬值,也许会赢得不少赞许眼光。最近持此建议的经济学家不少,中国也是如此。

能,剩下降低工资一条路可走,走得太辛苦。

言归正传。2015 年的中国需不需要货币贬值? 中国要不要承受一场货币购买力损失,以此为代价刺激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其它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压力?

上面问题需要细分成三个层次: 首先,中国经济存在什么样的调整压力? 其次,人民币贬值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货币贬值与其它手段相比,是不是一个合意的手段?

中国经济目前主要面临两方面压力。一是**结构转型压力**。一个国家由穷变富,要经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这个转型主要解决温饱 and 大众工业消费需求。第二次是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这个转型主要解决城市病、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类需求。中国正处于第二次转型过渡期,面临淘汰的工业落后产能和过度产能、稀缺的优质

服务供给、凸显的结构性失业压力、经济增长动力增速下降是过渡期的典型特征。

二是**债务高企压力**。政府为了应对转型困难采取了大量刺激政策,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积累了巨大债务。债务增长加速与收入增长放慢形成强烈反差,金融风险加剧。金融机构对坏账的担心升级,对发放信贷更加审慎。脆弱的金融系统让原本就增长乏力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经济过度下降风险加大。

面对上面两种压力,人民币贬值能发挥什么样作用? 货币贬值的效果如下:放慢淘汰落后产能,放慢淘汰过剩产能,放慢产业升级压力,放慢对服务业部门的资源挤入,刺激短期收入增长(并缓解债务负担)。

选择经济结构转型,不选择贬值;选择短期内的经济稳定,贬值是备选政策工具。结构转型与短期内的经济稳定,孰轻孰重? 权衡关

键是劳动力市场指标(不是经济增速,不是通货膨胀率,不是产能利用率,不是企业利润率)。如果失业压力凸显,存在大量非意愿失业,短期经济稳定应该赋以更高权重。反之,如果失业压力不显著,经济转型应该赋以更高权重。

从官方公布的就业数据看,目前中国就业市场总体情况还不算糟糕。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蓝领就业机会尚好,说明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经济结构转型引发的劳动力供求不匹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下滑,未来就业市场形势可能更加严峻,蓝领就业也有可能遭遇困难。

在还不能完全看清楚就业市场变化以前,不妨假定今后的就业市场会有更大压力,需要采取政策工具保障短期的宏观经济增速稳定。利用货币贬值与其它手段相比是不是更合意的手段?

如果是采取小幅渐进贬值,对经济刺激的作用很有限。企业并不明确未来的人民币会贬值到什么位置上,未来商品价格坐标不能确定,对相关的投资和生产的刺激作用也不会很明显。此外,渐进贬值的并发症是贬值预期刺激资本外逃,国内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遭遇巨大压力,这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危害更大。

一次性贬值呢? 一次性贬值还不够,必须是一次性贬值后重新盯住美元或者一篮子货币,才能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这个选择意味着放弃了汇率作为国内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资源配置价格杠杆,再次牺牲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上面提到的购买力损失、放慢经济结构转型等众多代价。

降息是应对债务高企和经济过度下滑的另一个手段。从国际经验看,这也是更常规、更容易操作的手段。对于缓解债务高企以及由此

引发的经济过度下滑,降息的效果更直接,而且没有官方主导货币贬值带来的巨大代价和诸多后遗症。

当前经济环境下,官方主动引导贬值不是个好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保持现有汇率水平稳定是最佳策略。美元升值背景下,官方刻意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人民币跟着美元一起升值,难道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币应该跟着美元升值?

从经济增长和福利角度看,人民币汇率究竟在什么位置上,才能在货币购买力与产品国际竞争力之间、结构调整与宏观稳定之间取得最好平衡? 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角度看,如何才能让人民币汇率成为应对国内外各种冲击的缓冲器,同时留给货币政策留下更独立的空间?

让市场给人民币定价,所有人民币利益相关的投票人会找到权衡的最佳平衡点,让市场给人民币定价,汇率波动成为国内外各种短期宏观经济冲击的吸收器而不是放大器。

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远做不到这些。中国货币当局在 2005 年 7 月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公告中就提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决定人民币汇率,但十年之后这个目标也没有真正实现。货币当局提出的中间价和波幅限制,基本把汇率变化锁定在货币当局意愿水平附近,而这样的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方式掺杂了太多货币当局意愿,扭曲和挤出了市场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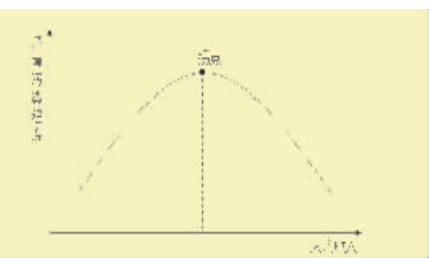
笔者认为,更彻底地退出外汇市场干预,包括取消中间价和扩大波幅限制,将是今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货币当局如果实在不放心,仍旧可以管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上下限,但这个上下限不应该是 2%或者 3%,要给市场留下更充足的空间。

中国临近增长与环境拐点

■ 卓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副主任

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倒 U 型关系

1995 年, 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的论文,以实证的方法提出,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现“倒 U 形”曲线,即:在低收入水平阶段,环境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在高收入水平阶段,环境随着经济发展而好转。由于与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类似,这一关系又被业内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上述研究还发现,两者关系的拐点因污染物指标的不同而异,大多数国家在人均收入 8000 美元以前达到拐点,特别是对于人均收入 10000—12000 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只有河流中的大肠菌指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示意图)

对于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之间拐点的出现,格鲁斯曼和克鲁格给出的解释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更加关注环境这一非经济目标,国家执行了更严格的环保标准,而多年发展也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清洁技术应用,这些都使得经济增长本身蕴含着积极的环境改善因素。

中国正在临近上述拐点。目前没有一个单独环境污染指标能够概括整个环境状况,但上述曲线实际上由若干环境污染指标组成,其中一些确实已经出现拐点。

从具体污染物指标的变化趋势来看,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所近期发布的报告,中国的一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已进入下降通道,如二氧化硫(SO₂)、氮氧化物(NO_x)等分别在 2006、2012 年出现了拐点,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和水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在 2016—2020 年出现。尽管如此,整体环境的改善与经济增长仍未形成正向关系。

同时,2014 年中国的人均 GDP 约 7500 美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2013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就已超过 11000 美元,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上述拐点。此外,中国

服务业占 GDP 比重已经超过工业比重,这也是中国临近上述拐点的依据之一。

当然,由于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即使中国已经临近甚至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拐点,也并不意味着整体环境质量就能立刻改善。更需要指出的是,格鲁斯曼和克鲁格的研究是对经济增长和环境关系的经验性描述,它并不是一个能够自发实现的过程。拐点能否到来以及何时到来,表面上看与产业结构变动、能源结构调整、治污技术升级等有密切关系,但驱动这些变化的关键因素是政府政策、企业转型和社会参与所构成的绿色机制。

从发展负担到市场机遇

当经济运行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侧,环保之于企业,是上市公司年报的成本压力,是社会责任报告的浓墨一笔,是宣传片旁白中的公益事业。在拐点到来之后,企业失去的是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得到的是一个需求巨大的市场空间。

企业要视环保为发展机遇而非负担。你还想得上次在电视中听到“日立牌是 Hitachi”的广告歌是什么时候吗?事实上,家电业务在日立集团的利润比重已经降到了 8%,节能环保领域的贡献则超过四分之一。与传统的环保企业不同,日立环保领域并非单纯的环保设备制造企业或环境治理服务商,而是上下游一体化的环保综合方案解决商。受益于其在机械制造、基础设施建设和 IT 技术领域的多年积累,该公司能根据客户节能减排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在大连科技城的智能电网、英国高铁运营服务、夏威夷风电系统中,都能看到这家企业跃入环保“蓝海”的身影。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节能环保市场潜力巨大,要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日立公司转型的案例启示我们,这不仅仅是针对专事环保设备制造企业、环境治理服务商的邀约,未来,传统的家电企业、能源企业乃至 IT 企业都有可能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转型为环境综合方案解决商。在制造能力完备、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创客效应已露端倪的今日之中国,小米净化器们只是中国企业打开环保市场的牛刀小试之作。

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拐点到来之前,经济增长之所以会以环境恶化为代价,根本原因在于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负外部性、保护生态的努力具有正外部性,已有市场机制无法给予行为主体以保护环境的激励。要实现从“环保小行业”向“环保大产业”的转变,就必须建立

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之间是相互对立的吗?面对视觉和记忆中都日渐模糊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身处经济增长快车道的中国人,很难给出否定的答案。然而,如果我们将观察的视角再放开一些,就会发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并非总是此消彼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临近两者关系逆转的拐点。



起激励相容的市场机制,消除环保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

应让污染隐性成本内部化。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以行政强制力创造出排污权的稀缺性,提高企业对节能减排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各类行业组织要通过对独立评估、量化企业投资行为的环境危害或收益,以社会责任的压力提高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2015 年以来,《证券时报》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始每周发布“上市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测风险排行榜”,计算上千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

关联企业的“环境风险指数”排名,并公开点名污染排放超标前 20 位的企业,为投资者提供上市公司环境责任风险的工具。虽然这一指数尚未对相关企业的股价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但我从今年正月十五北京的烟花稀落中收获了信心。也许,该是到了上市公司环境风险压力测试的时候了。

同时也要让环保隐性收益显性化。目前中国主要依靠政府普惠式的补贴政策来提高环保产业和环保消费行为的经济价值。但该补贴政策,不但削弱了企业依靠技术创新来降低环保成本的积极性,还容易形成地方政府干预下的产能过剩,影响了环保产业的良性发展。因此,要借助更加市场化的手段将环保产业的隐性收益显性化。如,更多地采用“能效领跑者计划”代替现有的补贴政策,通过树立行业标杆,对能效领跑者给予资金、研发等政策支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完善水权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高节能减排的整体效率;对保护流域、森林、草原等行为实行生态服务补偿机制,使贫困地区维护生态环境的努力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对循环经济、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实施优惠贷款利率的绿色信贷政策等等。

后发地区的鱼与熊掌

在不同的技术水平、制度背景、贸易地位、国际分工等条件下,“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位置是会发生改变的。后发国家的优势在于,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作为前车之鉴,节能、储能、治污等新技术日新月异,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这些都有利于后发国家的该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即污染物峰值会提

前,污染程度也会降低。

但不少研究者也提出,先发国家拐点的出现,与国际产业分工下的污染转移有关,后发国家可能因产业链分工长期被锁定在低端,而迟迟等不到鱼与熊掌兼得的拐点。

尽管格鲁斯曼和克鲁格在 1995 年的那篇论文里,用当时的数据样本所做的实证研究否定了这一猜想,但也有后续研究呈现出相反的结论。这再次提醒我们,“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并不是守株待兔式的发展路线图。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它们要尽早挣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束缚,必须发挥后发优势,突破后发劣势。一方面,后发国家必须更多地从先发国家引进节能减排的先进技术,并借助国际社会达成的各种气候、环境协定和规制所传导的压力,推动国内环保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要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调整的机会,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新材料、3D 打印等技术,实现产业分工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

行文至此,想起了 2013 年由马特·达蒙编剧并主演的电影《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影片讲述了能源巨头公司的王牌业务员,来到页岩气储量丰富的宁静小镇,向因金融危机而陷入困境的居民宣传页岩气开发是经济效益和环境效应双丰收的大好事。然而,在前大学教授和无间道式的非政府组织(NGO)搅局之下,页岩气开发的环境风险深入民心,能源巨头的阴谋以失败告终。故事的套路并不新鲜,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镇上失业且不具备流动技能的居民在取舍鱼与熊掌时的挣扎。如果中国粗放的发展方式不及时转型,资源环境密集型产业不大力度调整,“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拐点的到来也不会必然成为民众的福祉。

向的,并无舆论场中常见的针对一定问题的所谓“左右之争”。

在普通民众中,柴静的视频本身,也未引起太大争议。对普通民众来说,《穹顶之下》除了数据更翔实,更容易打动人,其观点与以往涉及雾霾的节目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至于视频有多火,普通老百姓并不关心,也不会觉得诧异,毕竟,他们不会对《穹顶之下》进行细分与定位,对他们来说,它无非众多节目之中的一个,再火,火得过《新闻联播》与《焦点访谈》么? (下转 02 版)

一部环保纪录片的舆论失焦

■ 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2 月 28 日,柴静的新作《穹顶之下》首发。播出仅一天,就引爆网络,播放近亿。伴随巨大成功的同时,是巨大的争议。本应是透过柴静看雾霾,却演绎成了透过雾霾看柴静。

实际上,在专业人士群体,比如经济学家与医学界人士,对《穹顶之下》的评价偏向正面。比如,在世界顶级学术杂志之一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空气污染对预期寿命的长期影响:基于中国淮河取暖分界线的证据》的北大陈玉宇,

对《穹顶之下》就做出了正面评价。《穹顶之下》能得到专业与权威人士的支持并不奇怪,毕竟其信源是主流科学家、医生、政府官员,这已能够充分保证视频的数据是可靠的。

除了专业人士,《穹顶之下》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府权威官员的认可。新就任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就对外界表示:在看过片子之后,亲自发短信对柴静表示感谢。而在此之前,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表示要留住 APEC 蓝。所以,《穹顶之下》的讨论是符合政策取